

走出文革連載3

走出文革

阿春的小方中

(接上一期)

母親是文盲，父親讀過四年小學。家裏對我僅有的一次輔導是，母親在我寫毛筆字時悄悄地從背後將我手中的毛筆抽掉，告訴我寫字時筆要握緊，說這是她從我外祖父教她的兩個弟弟寫毛筆字時偷學到的。

我始終記得她當時的一臉嚴肅和驕傲。

還記得家裏唯一的桌子是一張飯桌，幾碗剩菜剩飯占了大半桌面，餘下的一個小角是我做作業的地盤，但也非是法定的，並無保障，常常需要淚如泉涌後，在母親的支持下和也想占用這個小角抽煙讀報的父親爭奪這塊珍貴的地盤。我人生中的第一個獨用的寫字臺是將近而立之年時在四川請木工做的，後來又跟隨我碾轉到了武漢、南京，可見它在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但我從小就喜歡讀書，小學六年，每年都評為優秀學生，受到全校表揚。也有物質獎勵，除了被選送去少年宮看演出或游樂外，最難忘的是在夏令營度過的假期，鮮花篝火，俊男靚女，美食甜點。

也有缺點，記錄在案的是“喜哭”。直到現在，我依舊容易被感動，一感動就熱淚盈眶。

李安也愛哭，他說：“哭是真情的流露。”

但我的仕途從小就不佳，雖然一直是三好學生，好不容易才混到“兩道杠”。所以，我一直很羨慕欽佩那些佩戴“三道杠”的，也一直没有弄明白我這個屢受全校表揚的學生何以不能官運亨通，或許是因為當官的男兒有淚不輕彈。

記憶中的那個“三道杠”是一個插班生，女的，比我們大好幾歲，上海紡織系統的革命幹部子弟，因為父親革命了，耽誤了上學。記得有一次春游，車擠，她抱着我坐在她腿上，可見年齡差距之大。我大姐上學時也比同班的同學大了六歲。這種現象大概是那些貴族學校裏沒有的。

不記得學校有沒有圖書館，課外讀物主要是連環畫，得自己去小人書攤租。家裏偶爾給個一角、二角，會一連高興好幾天，因為可以用來租書。為了多看幾本小人書，就到街上撿香煙屁股（一副很沒家教的樣子），將未抽過的煙絲剝出來到賣煙絲的攤換錢。走路時眼睛不是看來往的美女，而是朝地上看。發現目標後便蹲下，裝作系鞋帶的樣子。脖子上還系着紅領巾呢，可不能沾污烈士的鮮血。

也做過科學試驗，知道了電磁轉化的道理後帶了兩個小伙伴跑到提籃橋，將斷了的鋸片放在有軌電車軌道上磁化，再製成帶磁性的刀片。這個偉大的試驗被警方認定威脅了交通安全，所幸的是警察執法文明，祇是嚴加訓斥，並沒有拘留我們。我們也沒有強行逃跑，否則難免會像雷洋和聶樹斌那樣“胃內容物吸進呼吸道”，或去玉米田裏生死走一回。

古往今來，窮人的孩子都是在街上長大的，即使在學校是個好學生，也不例外。我現在頭腦裏的某些知識大概便是用香煙屁股換來的，或是在街上學到的。

我的數學老師很早就發現我有數學天分。有次上課時，我提出一個解題方法，他很驚奇，說這是

高等數學裏會學到的方法，表揚我將來會有成就。我不記得是什麼樣的一個題目，但我記得老師姓席。其他老師的名字都忘了，那個學校肯定沒有出過名教師。

讀小學的那幾年，全家擠住在通北路底棚戶區的一間木板房裏。那時候，母親在江蘇路附近的一個紡織廠工作。這通北路位于上海市的東北角，而江蘇路却在上海市的西南角，母親祇有周末才能回家。棚戶區裏的木板房戶戶相連，不僅冬冷夏熱，而且滋生無數的臭蟲、跳蚤、蟑螂、蚊子和蒼蠅。

雖然是貧民般的生活，但顛沛流離了十幾年的父母終於有了一個安定的家。

我也覺得這裏不乏童趣。

百草園泥墻根一帶，低唱的油蛉、彈琴的蟋蟀，以及斷磚下的蜈蚣和斑蝥，曾使童年時的魯迅感到無限趣味。我無須走到百草園或其他什麼園子，在木板屋裏裏外外的磚塊下或板縫裏經常可以看到蜈蚣、壁虎和蟋蟀。斑蝥是沒有的，我最喜歡的是小小的“西瓜蟲”。倘若用手指觸動它，便會卷成一個球形，可以放在手心細細欣賞它身上的斑紋。

大門外不遠處是條一米多寬的臭水溝，淺淺的水下是又黑又臭的污泥。臭水溝成了孩子們練習跳遠的運動場。

當然，最使我流連忘返的是那個出租連環畫的小店，它給了我文學和歷史的早期啟蒙。昭君和番、張騫出塞和岳母刺字，這些和歷史相關的連環畫是我當時最愛看的。離棚戶區不遠處有一片瓦房，

當地人稱為“王家花園”。這王家花園的主人“王家娘娘”據說是陳賡將軍的至親。五十年代初，曾目睹陳賡來此省親。1930年前後，陳賡在上海擔任中共特科情報科長時化名王庸，人稱王先生，看來和這王家花園也有點關係。

王家娘娘三十多歲，絕對是一個大家閨秀，人也漂亮。她十分疼愛我這個窮人家的孩子，經常要我去和她的兩個比我大幾歲但很可愛的女兒玩耍。有一次，我因放在抽屜裏用來租連環畫的一角錢找不到而傷心地哭了起來。王家娘娘看到後趕緊讓人去買了一套三十多本的

《三國演義》連環畫送給我，讓我破涕為笑。

就像長媽媽買給哥兒的繪圖《山海經》一樣，這套我心儀已久的連環畫成了我童年記憶中最珍貴的禮物。

我曾重訪王家花園，然而滄海桑田，那一片瓦房早已不復存在，舊時的痕迹也難以辨認了。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難以忘却高中時在一篇作文中寫下的這句話：“我從鄉下出來，在繁華的上海灘住了九年，轉眼間又到了北京城”，總是在心中默讀。這大概是因為我難以忘却在上海灘的九年，那個不知愁滋味的少年時代，那個當我身處天涯海角時無時無刻不在召喚我歸來的美麗夢境。

我難忘夏令營的鮮花和篝火邊的歌聲催生着朦朧的愛的萌芽。因為當年的朦朧和歲月的久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遠，讀小學時的“初戀”少女祇留下婀娜的身姿，那是我放學後站在街頭等待她路過時留下的玫瑰色記憶。沒有姓名，沒有交往的經歷，祇有惆悵和甜蜜的記憶。

在夜雨中，和父親坐着三輪車到東長治路看電影，三十年代的舊片或外國片，印象深的有《十字街頭》、《馬路天使》和印度電影《兩畝田》。

從三輪車上遮雨的蓬簾縫中看出去，昏暗的街燈、兩側的西式建築和三十年代的電影鏡頭混合成我對這座城市的一種神秘感受。等我稍許長大後，我開始迷上了三十年代在這裏發生過的一切，無論是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歷史人物，魯迅的或張愛玲的文學作品，乃至中外冒險家的傳奇命運和白先勇筆下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這座城市也讓我對人的政治命運有了朦朧的覺醒。（未完待續）

南京·東京連載3

南京·東京(三)



本報特約作家 鄒雷

(接上一期)

如果說作品《海》是感染了劉洪友，那麼作品《崩壞》就是強烈震撼了。《崩壞》表達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日本國土受到美國空軍襲擊，炸彈如雨般投下，建築物瞬間崩塌、灰飛煙滅的情境，戰爭的破壞力和毀滅性躍然紙上，震撼人心。用簡單的兩個字表達了一個具體形象的畫面，而且如此生動準確，這是劉洪友從沒有見識過的書法藝術。用文字筆墨的動勢來展示物體崩壞的現象，來表達難以用語言敘述的淒涼，來渲染建築崩潰倒塌的恐怖，構成了書法作品《崩壞》巨大的震撼之美。當時有

一個外國人看了這幅作品後，用英語說，“這是物體崩壞的景象。”劉洪友問他，“你認識這個漢字？”他的回答讓劉洪友非常驚訝，“我不認識，可我能感覺到。”據說，這幅作品在歐洲展出時，觀眾基本上都能從中體會到崩潰和毀滅的意境，都能從中玩味出漢字的深意。此件書法作品被西方譽為“世界最高藝術”。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舉辦的“手島右卿作品展”，觀眾如雲，盛況空前。從5月5日到6月6日，一個月的展期裏，參觀書展的人數多達十一萬人，創下了當時書法界的奇蹟。

手島右卿一改日本傳統書法追求整潔、機械拘謹的字體風格，對書法藝術進行了創新，提倡“解放自我，打破規矩，蓬勃向上，揮灑自由”，與中國傳統書法真正拉開了距離。這對年輕的劉洪友來說，

無疑是一次徹頭徹尾、從裏到外的洗禮。

以前曾有人說過，“中國人在十年後會到日本學習書法”，這難道會一語成讖嗎？

“手島右卿‘崩壞’了我。”劉洪友如是說。從此，他萌生了去日本研修書法的念頭。

懂書法的人都應該知道書法大家楊守敬。他是清末湖北宜都人，七次考進士皆名落孫山，及第無望，後被選作日本公使隨員。赴日時，他帶去了一萬多件六朝碑刻（包括秦漢碑刻）拓片，日本書道界聞訊，趨之若鶩。雖語言不通，好在中日都用漢字，他們便“筆墨傳情”，通過書寫漢字來交流。就這樣，楊守敬把書法技藝傳給了日下部鳴鶴等人，日下先生又傳給了比田井夫等書道家。日本書道家為中國書法的魅力所傾倒，有的人幹

脆直奔中國本土，學習當時的碑派風格，在書法界刮起了一股“六朝風”。這撥書道家被視為新派書法。可以說，沒有楊守敬，就沒有日本現代和當代書法，也就不可能出現手島右卿。說楊守敬是日本書法革新的催化劑，那是一點都不為過的。

楊守敬當初去日本，並沒有傳播書法的想法，也沒有想過自己會對日本的書法史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成為近代日本書法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劉洪友的初衷是到日本學書法，沒想到後來為克服日本當下書法教學弊端，創立了自己的教學模式，出版了13本書法教材，教授25種碑帖寫法，深受日本人的歡迎。這是後話，暫且不提。和楊守敬如出一轍的是，劉洪友也是無心插柳成蔭，最終成了日本書法界的中國名人。

南京·東京(四)

追夢決定去東瀛
3.36封“介紹信”

這些年的中日書法交往中，中國書法家們結識了一批日本書道界的名家。劉洪友打算把自己去日本研修的想法告訴他的書法老師和前輩，並徵求他們的意見。登門之前他就想好了，如果老師們同意，就請他們幫忙給日本朋友寫封信，他帶上老師們的“介紹信”去日本。

在南京，林散之與日本書法界接觸時間最為久遠。1972年，林散之在中日書法交流選拔時一舉成名，其書法作品《中日友誼詩》被譽為“林散之第一草書”。他的詩、書、畫被趙樸初、啓功等書法界名家稱之“當代三絕”，與李志敏并稱

“南林北李”。1973年1月5日，《人民中國》雜誌第1期刊出《清平樂·會昌》草書條幅，震動海內外書壇。此後，日本書道界的訪華團體來中國，都以能拜會林散之為榮，對其書法推崇備至。是年春，他為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作了《書贈日本友人》二首詩。1975年3月，以村上三島為團長的日本書法訪華代表團來寧，到南京藝術學院拜訪林散之，林散之作《日本書法代表團蒞華訪問賦此四章》以贈。1979年2月，日本書道家友好訪華團來寧拜訪。1983年3月，林散之的作品被選送參加中國書法家協會在北京舉行的“慶祝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五周年中日書法藝術交流展”。1984年5月16日，日中書法友好訪華團在莫愁湖鬱金堂與林散之晤面。團長青山杉雨高度

贊賞林散之的草書藝術，題寫了“草聖遺法在此翁”，進一步明確了林散之的“草聖”地位。5月17日，“第二屆中日聯合書法展覽”在江蘇省美術館開幕，林散之出席了開幕式。11月19日，北京《瞭望》周刊第47期發表張欣文章《草聖遺風在此翁一記老書法家林散之》。從此，林散之被譽為“當代草聖”，並流傳開來。

劉洪友與林老素有交往。林老年歲已高，行動不便，平時在南京的各種書畫展上，劉洪友常為他推輪椅。有一次，劉洪友拿着自己寫的歐體去百子亭附近的中央路（大慶路）117號林老家中，請他指點。那時已經是上午十點多鐘了，林老剛起床，他接過這篇習作，看了看，然後大聲說：“好！”嚇了劉洪友一大跳。林老早在1966年就雙

耳失聰，所以他并不知道自己說話的音量如此之大。他的書畫落款用的是“聾叟”“散耳”“林散耳”，有點自嘲的幽默味道。劉洪友開始謀劃幫林老過九十歲生日。自己是小字輩，這麼大的事不敢自作主張，於是，他跟南京書法家協會主席、入門老師章炳文做了匯報，打算拿出兩個月的工資來辦這件事，得到章炳文的許可。為了烘托壽宴的氣氛，劉洪友特意托姐姐到街上扯紅綢布，請陳大羽寫上一個大大的“壽”字，掛在雙門樓賓館1號樓的宴會廳。同時邀請蕭嫻、陳大羽、武中奇、尉天池、章炳文、張節、陳慎之、徐純原、桑作楷、莊希祖、楊康樂、王鵬、林小虎、端木麗生等書畫界的朋友，熱熱鬧鬧地擺了兩桌。劉洪友精心策劃和組織的這場壽宴，讓林老很是感動。他激動

地連聲表揚劉洪友，稱他是“熱心人、有心人”。

劉洪友這次登門，因事關重大，怕林老聽不清，便用筆墨和林老交流：“我想去日本研修書法，林老您看行不行？”林散之馬上揮筆寫了個“好”。劉洪友心想，我要的就是您這個“好”字。他繼續寫道：“那請您給日本書法界的朋友寫封推薦信，請他們給我點關照可好？”林老看後馬上拿來信箋，找了小楷毛筆，龍飛鳳舞揚揚灑灑，認真地寫了兩頁紙。

旗開得勝，劉洪友順利地拿到了林散之的“介紹信”，回來後反復欣賞這件書法“作品”。有一天，他突然想到一個關鍵性問題，假如這封信不起作用怎麼辦？不行，還得去找其他人，越多越好，說不定哪封信能起作用呢！